

落實《國歌法》：大處着眼小處入手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國歌法》列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後，香港接連發生兩起某些球迷公然侮辱國歌事件。鑒此，一部分香港居民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訂訂本地落實《國歌法》的相關法律並規定具追溯力。

這樣的要求是完全能夠理解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從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之日起，《國歌法》已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具有法律效力。問題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國旗法》和《國徽法》時沒有具追溯力的規定，因為，按照香港的司法傳統不應具追溯力。如果落實《國歌法》具追溯力，那便是開了先河。

為提供論據，有人提議，如果在特區政府進行相關本地立法期間，香港出現大規模侮辱國歌事件，那麼，有關本地法律就應具追溯力。於是，問題產生了——已然發生的兩起某些球迷公然侮辱國歌事件，是否屬於「大規模」？在特區完成相關立法程序前，會否發生稱得上「大規模」的侮辱國歌事件？

我不主張也不願意介入這一類討論或爭論。在我看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國歌法》應大處着眼、小處入手。

立法需設有追溯力

「大處着眼」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國歌法》並將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固然有針對近些年「港獨」勢力抬頭的考慮。但是，從長期看，是鞏固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安全、捍衛國家發展利益的應有之義。因此，在香港完成本地相應立法工作，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在香港生效之間的時間裏，必須有追溯力。需要考慮的不只是香港本地是否出現「大規模」侮辱國歌事件，還有特區是否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裏順利完成本地相關立法。

如果反對派百般阻撓立法會通過香港本地實施《國歌法》的相關立法程序，而期間反對派又策動一部分香港居民不斷製造公然侮辱國歌事件，那麼，將會發生的可能不止本地法律具追溯力，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採取相應法律措施。所以，從現在起，香港社

政情觀察

楊 堅

會各界應當重視的是宣傳《國歌法》，盡可能消除在本地完成相應立法程序前發生「大規模」公然侮辱國歌事件，同時，敦促反對派不要在立法會阻撓相關立法程序。

反對派阻撓《國歌法》在香港落實的藉口有二。一是本地法律必須明確細緻，以免司法機構隨意「拉人」；二是有關本地法律必須諮詢公眾。前一個藉口是關鍵，反對派會以有關法律草案既不明確又欠細緻為由，發動一部分香港居民反對。

《國歌法》和《國旗法》、《國徽法》一樣，既有「治惡」功能，也有「揚善」作用。「治惡」是指依法懲處公然侮辱國歌、國旗、國徽者。「揚善」是指提倡公民（居民）尊重國歌、國旗、國徽。在「惡」與「善」之間存在着中間地帶，屬於社會倫理教化的區域。在香港，任何人只要不是蓄意侮

辱國歌、國旗、國徽，即使不那麼尊重，有關法律都不會管，而是由政府 and 相關團體或企業提供道德教育。

重視日常倫理教化

明白了這一點，就容易明白反對派要求香港本地落實《國歌法》必須明確細緻純屬藉口。因為，既不可能有包羅萬象般的細緻，也不可能有著表裏一致的明確。舉一個例子。在公眾場所奏國歌、升國旗時，法律規定必須「肅立」，但是，法律無法規定何為「不肅立」。某人偽裝肚疼而蹲下，某人確因肚疼而不得不蹲下，豈能等量齊觀？前者固然表達不尊重國歌和國旗，但是未至於法律需要懲處的地步。可見，有關立法宜簡明，非所謂「明確細緻」。而且，香港落實《國歌法》的大量工作在於日常的倫理教化，此所謂「小處入手」。

香港足總對於《國歌法》頒布後香港某些球迷依然公然侮辱國歌表示深為遺憾和無奈。但是，足總可以做一些事情提醒球迷必須尊重國歌，譬如，在球場入口放置大幅宣

傳牌，列明《國歌法》有關規定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某些球迷公然侮辱國歌時加以勸止。香港司法機關在本地完成相關立法工作前固然不可能執法，但是，警方應派員到公共場所譬如大球場，對不聽勸止而繼續公然侮辱國歌者實施「驅離」。

從遏制「港獨」開始，香港社會必須樹立關於言論自由的法律底線和道德底線。既不能把鼓吹「港獨」視為言論自由而聽之任之，也不能把公然侮辱國歌的聲音和標語視為言論自由而置若罔聞。這一類言論不僅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底線，而且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道德底線。

在香港，不是中國公民的永久居民能夠對中國國歌、國旗、國徽表示尊重，是基於「入鄉問俗」的做人應有道德。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公民，理應尊重國歌、國旗、國徽。即使那些對國家政治制度不滿甚至持反對立場的香港的中國公民，至少不應當對國歌、國旗、國徽表達不尊重。

資深評論員

救立會良方：不開會就扣人工

有話要說
博 梁

為讓自己可以繼續荒唐，當立法會大會上周四早上復會時，「議會陣線」議員朱凱迪、毛孟靜先後要求點算人數，其中後者成功觸發「流會」，是今屆會期開始僅個半月的第二度「流會」。

有「流會」始作俑者過往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責任推到建制派身上，這是不合理的。需知道，法定開會門檻的人數是三十五人，建制派只有四十人。就以上星期流會的一刻為例，仍在會議廳的反對派議員實際上只有正在發言的民主黨議員鄭俊宇一人，而建制派議員則超過三十人，出席率肯定不算低，但始終抵禦不了年年有、月月有、日日有的點人數攻擊。

且值得指出的是，當時立法會正審議由政府提出、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涉及上調刑事法律援助費用等情況，根本就不是什麼爭議性議題。繼上回動議驅趕記者離場震驚全城後，朱凱迪之流今次又再以拖延審議議事規則的修訂作為藉口，再一次展現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卑劣手法。說到底，為的就是保住他們繼續荒唐的權利。

議員薪津既然出自公帑，每一名議員便有開會的責任，如果整天只是搞毫無意義的抗爭和拖延，這個薪津高達十萬元的「肥缺」，又何需「勞煩」反對派來做？敢問你們每月「袋袋平安」的時候，當想起與這些項目息息相關的苦主因此受連累時，可有一絲愧疚？教人吃驚的是，朱凱迪揚言「要打好這場戰爭」，毛孟靜狂言立法會進入了「戰爭狀態」。這令我們想起古往今來不同類型的戰爭，受害的不是別人，正是人民。反對派在立法會「宣戰」的時候，可曾得到港人的同意？

猶幸，服務立法會多年的前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日前出席一個節目時或許已為我們提供了解決當下窘境的「良方」。曾為立法會撰寫「議會天書」——《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的吳文華透露，行管會遇到流會時可考慮扣減缺席議員薪金。她直言有關建議毋須修改議事規則，只須行管會同意即可。

順帶一提，已被DQ的游蕙禎、梁頌恆早前被迫討共一百八十六萬元的薪津，惟兩人於立法會還款「死線」已過仍未「回水」，事隔至今已有多日，有指立法會有關方面仍未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法院作出裁決。這肯定是失職！

謹寄語行管會，應做的事請盡快動手去做，莫再浪費時間，蹉跎歲月。套用財委會主席陳健波一句話：最重要是憑良心做事。

新時代下的香港發展方向



議論風生
孔永樂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兼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日前應邀出席團結香港基金與中華學社聯合主辦的論壇，宣講十九大精神。演講主要分六大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國家在過去五年的變革、現時社會矛盾的主要因素、一兩個「百年」奮鬥目標的規劃、未來在政經社會發展的基本方略，以及香港在國家發展藍圖下的新機遇。易綱詳細透析了十九大的重要內容，特別在演講中運用了大量經濟數據與生活案例，比較中國過去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以及香港的獨特優勢，當中不少要點都值得從政者深入討論。

反對派攻擊國家重要官員來港宣講十九大精神是「洗腦」，並且會加強對香港意識形態的控制。這種觀點明顯忽視出席人士的年資及其社會經歷。出席講座的都是成年人，當中之高級公務員及社會優秀人才，「洗腦」之說實在難以成立。重要的是，現時國家發展受到世界注目，香港不單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國際大都會。政商人士也需要多了解十九大報告。

重視經濟發展下的環境保護

第一，現時中國已經注意及重視經濟發展下的環境保護。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對生態環境非常重視。當中，「生態文明」提及多達十二次，「美麗」則有八次，「綠色」更有十五次。易綱在演講中指出，現時國家報告提出建設「和諧」社會時，還重點加上了「美麗」一詞，目標強調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人們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習近平曾表示，我們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美麗的生態環境。二〇一六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的生態文明建設的相關文件已超過二十個，中央環保督察覆蓋全國三十一個省份。可見，這是中國重視生態文明的新時代。這一方面正補足了傳統西方經濟理論中對生態環境的忽視。關於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上世

紀不少學者提出過各種不同理論。較著名的包括美國經濟學家Walt Rostow提出的概念，一個社會發展需要經過五個階段：原始社會階段、準備起飛階段、起飛階段、走向成熟及大眾社會階段。誠然，如何界定第二至第四階段仍然存在眾多問題，同時還有，政府在發展經濟上是否存在重要的角色。

經濟學者一般認為，英國自十九世紀起繼承亞當·史密斯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有助經濟發展。然而，英國劍橋大學韓裔經濟學家張夏淮教授（Chang Ha-Toon）詳盡分析英國、美國、法國、荷蘭及德國等多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史，最終總結，政府大力規劃及扶助行業才有效解決工業經濟相對落後的情況。例如，被認為英國第一位首相的沃波爾（Robert Walpole）積極發展羊毛製造業，為日後國際貿易奠下基礎。

當然，這結論引起極大學術爭論。筆者認為，無論是政府大力投放資源或小政府角色，兩百多年來的西方經濟發展理論一直忽視環境範疇，故此也令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下，氣候及自然生態境況變得越來越嚴峻。經濟哲學上更出現了「共享物品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之說，意指指大氣層、海洋、湖泊、青草地等共享物品往往可以因短期的經濟發展利益而犧牲。以往，各地政府不是因「小政府」角色對問題視而不見，就是因發展經濟而作出取捨。這次，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生態環境的重要，稱得上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方向。

殖民政治治在百多年的管治中，根本甚少理會自然生態的問題。直至一九六〇年代，英國政府才委託美國學者研究香港的自然保育政策，到一九七〇年代制定法律及規劃郊野公園。然而，香港城市基本欠缺綠化規劃，市區中心（例如中環、金鐘、上環甚至油尖旺地帶）的綠化比例令人失望。這方面新加坡比香港規劃相對優勝，位於新加坡鬧市中心的烏節路（Orchard Road），旁邊的植物園（Botanic Garden）佔地約七十四公頃，香港金鐘的動植物公園則只有五點六公頃，植物多樣化也相對遜色。另一方面，《郊野公園條例》限制了香港土地規劃。回歸後在「弱政府」的情況下，各方利益團體更將郊野公園變成了政治鬥爭地方。若然未來特區政府如十九大報告般強調以建設和諧美麗的社會為目標，香港市民也會有所得益。

在確立自信基礎上精益求精

這涉及第二個重要的大問題，香港究竟如何發展？近年來香港的發展失去了昔日的自信，也因此而迷失了方向。這與媒體刻意放大矛盾及過度聚焦政治意識形態分歧有密切關係。這種傾向特別令青年對香港各方面越來越不滿，並失去學習鄰近各地區城市管治的動力。筆者認識一些完全不看香港媒體的外國學生，他們對香港的印象完全不同。

易綱也在論壇提到，香港的醫療保障、養老及物業管理等方面值得內地借鑑，而港鐵則在北京營運兩條地鐵線路。當然，以上各領域可能仍有改善的地方，但香港市民需要先得得認同及欣賞，然後再努力精益求精。

未來，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都有重大合作機會。在此情況下，社會精英更不應只從媒體了解香港社會，從而決定政經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國家已明確展示基本方略及發展藍圖，正全面深化改革，回顧五年管治經驗，處理社會矛盾問題。在新時代下，香港的傑出領袖必須具備前瞻及務實精神，為香港整體社會定立良好的發展方向。理想地看，從政者必須多學習各方長處、各地社會建設及管理模式，並總結過往經驗及文化，設計出一種合適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方案，令市民受惠。

城市智庫成員，「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埃及恐襲昭示全球反恐任重道遠

埃及恐襲案震驚全球。埃及北西奈省一座清真寺上周五遭恐怖分子襲擊，此次恐襲已造成至少235人死亡，130人受傷，是近年來埃及遭遇的最致命的恐襲。埃及總統塞西宣布對恐怖分子進行反擊，埃及全國將哀悼三天。全球多國也強烈譴責此次恐襲，呼籲加強反恐，但目前暫無組織宣稱對襲擊負責。

此次恐襲事件或為「伊斯蘭國」（ISIS）或其埃及的分支機構所為。據悉，受襲清真寺的信徒多為遜尼派中的蘇非派分支，該派系是ISIS主要的襲擊目標之一。此外，埃及政府過去三年來一直在西奈半島打擊極端伊斯蘭武裝分子，該地區主要的極端組織前身是「耶路撒冷支持者」，2014年起宣布效忠ISIS。因此，埃及此次恐襲事件，和ISIS脫不了關係。

內亂導致恐怖主義蔓延

埃及清真寺恐襲事件，是在中東各國宣布打擊ISIS取得重要成果、認為ISIS已是窮

途末路的情勢下發生的。這顯然給中東地區和全球發出了信號，全球反恐依然任重道遠。從中東到俄羅斯，從歐洲到美國，恐怖襲擊不僅花樣繁多，而且像病毒一樣傳染蔓延。恐怖襲擊是基地組織的遺毒，還是ISIS的播撒，又或是西方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文明衝突」？

美國的反恐戰爭可以消滅本·拉登，讓基地組織消亡。但拉登死了還是有巴格達迪，基地組織衰微了，ISIS影響力卻更甚，甚至在西方世界也有強大的感召力。不久前發生在紐約曼哈頓的卡車撞人事件就屬此類，從烏茲別克斯坦移民至美國的29歲嫌犯賽波夫，就承認自己是以極端組織的名義發動襲擊。

在歐洲，頻繁的「獨狼」式恐襲案，也和移民、難民脫不了關係。這似乎成了西方世界解不開的死結。一方面，西方世界不能因為恐怖襲擊案而對移民、難民實施不當政策，這關乎政治正確。而且，也是政治和道德的雙重大忌，特朗普的「限穆令」被美國

國際觀察

張敬偉

乃至全球鞭撻，歐洲反移民的浪潮也被視為民粹主義。另一方面，歐美社會的經濟發展境況，的確也讓移民和難民們感到不滿，從而為極端宗教思想所滲透，一不小心就會演化為恐怖襲擊。更諷刺的是，西方世界的民粹主義也無法解決這一難題，反而會激化社會矛盾，讓一部分極端宗教分子鋌而走險。

西方世界尚且如此，中東地區更是恐怖襲擊的淵藪。埃及作為阿拉伯大國，並不處於中東各方勢力博弈的核心。但是2011年埃及出現動亂導致前總統穆巴拉克下台後，埃及宗教政黨兄弟會執政，然穆爾西總統好景不常，在2013年7月被軍方解職。數年政治動盪，使埃及國內的極端宗教分子成了武裝組織，當ISIS在中東肆虐時，埃及國內的極端武裝分子又和ISIS勾結在一起。因此，埃

及發生如此重大傷亡的恐襲案件，是埃及多年政局動盪的結果。因為國家政局不穩，導致國內政治、宗教派系之爭，內亂引來外患，恐怖主義的種子就在埃及生根發芽。

糟糕的是，埃及軍警在西奈半島多年反恐，並未能清剿恐怖分子。因此，只要恐怖主義的種子還在，這就不是埃及最後一次恐襲。

國際反恐陣線未真正形成

更尷尬的是，中東很多國家，近期都宣布打擊ISIS取得了重大勝利，甚至樂觀表示ISIS已經名存實亡。但是這種樂觀，本身就是不可靠的。ISIS能夠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攻城略地，短時間內成為具有「國家」形態的恐怖組織，凸顯中東地區的宗教、地緣政治博弈複雜，難以形成反恐合力。此外，即使是美歐俄加入反恐，而且擁有強大的反恐武力支持，但它們在中東也各有企圖。

ISIS是靠鑽了反恐力量的漏洞和空子，

才可以在中東地區成為大患。反恐力量各懷鬼胎，自然也會付出沉重代價。歐洲不僅有難民危機，而且使恐怖主義在內部肆虐，即使美國也難逃零星的恐怖襲擊。中東地區，無論敘利亞、伊朗還是其他國家，恐怖襲擊簡直成了家常便飯。埃及內亂，恐怖組織伺機而為，也就不難理解了。

只要國家反恐難以形成統一戰線，即使是窮途末路的ISIS也會因獸猶鬥，比以往更瘋狂。只要有可能，ISIS和其分支機構乃至受ISIS影響的極端宗教分子，還會繼續製造恐怖襲擊。現在是埃及，下一個或許就是歐洲某國或美國某地……

然而，國際反恐陣線並未真正形成。每當一國發生恐襲，其他國家無非是哀悼、安慰加口號式的宣示，這種看似堅定的外交修辭，反而折射國際社會的無力乃至虛偽。當國際社會紛紛譴責恐怖分子是懦夫時，國際社會是否該反思一下自己的無所作為呢！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